

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再析(1869-1881)

——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考释

刘青峰

内容摘要:借助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对张之洞致张佩纶有关书札进行考订释读,可以追觅“清流”时期的张之洞与李鸿章的早年交往、密谋、合作与分歧。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张之洞以“洋务”立身鸣世,与李鸿章有了合作的基础,张李二人渐有直接往来与合作。为应对时局,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内、外朝相互呼应,共同配合琉球罢约、光绪七年沿海督抚调整及左宗棠的外调。这些事件凸显张之洞的主动性,而非仅为李鸿章的拉拢或张佩纶的穿引。探讨张李二人的早年交际,证实张之洞从“清流”向“洋务派”转变的论述模式存在可商榷之处。对近代史所藏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进行刊布,亦可补各版本《张之洞全集》之不足。

关键词:张之洞 李鸿章 张佩纶 “清流” 张之洞书札

引言

作为地方大员的张之洞,以洋务派和改革者的面目活跃于晚清政坛。李鸿章则自天津教案后至甲午前,长期以大学士总督直隶兼北洋大臣,在洋务和外交中具有相当影响力。二人在洋务建设、中法战争、庚子议和等问题上有合作也有分歧。而对于双方早年间的关系,吴剑杰认为,作为“清流党”的张之洞与李鸿章谈不上私交和个人恩怨,而在朝政上出于公心各有不同的意见^①。虽然有学者对于张之洞从“清流”到“洋务派”的转变的说法提出质疑,在具体的某些问题上也证明了“清流”与李鸿章曾存在合作关系^②,

①吴剑杰:《张之洞与李鸿章》,《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6年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5-154页;《张之洞散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9-219页。

②谢放虽然认为“一些论著总将清流作为与洋务派不同的一个政治派别来看待,而且将张之洞作为一个从清流转向洋务派的典型代表。其实,清流与洋务派很难说(转下页)

但由于光绪八年(1882)前张之洞与李鸿章往来材料相对缺乏,无法实证他们早年的交际。戴海斌探讨过张之洞与李鸿章的早期交往,认为洋务与清流并非疆界分明,然而终究“各有门面”^①。论证较为详实,但同样因为缺乏张之洞方面一手的材料,无法凸显张之洞在其中的主动性。

在所谓的“清流”交往中,张之洞与张佩纶关系密切且有私交,许多事皆有合谋,并有“青牛角”之谓;李鸿章因故交的关系,对张佩纶更是有拉拢、提拔之意^②。因此,虽然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材料阙如,通过二张的书信往来仍可透露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的信息。目前所见较为集中的张之洞早年致张佩纶书信有两宗:一是赵德馨等主编的《张之洞全集》(以下简称“武汉版”)从《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辑录张之洞光绪初年致张佩纶的书信。这些书信并无具体时间,且内容做了大量删节、剪裁。据黄濬称,此书信是许同莘“从丰润(按:张佩纶)家转辑出者较多”^③。二是2012年广州图书馆主编一册《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该书札亦大多没有时间,其中有数通信件为隐语,研究者无法准确解读,误以为是谈风雅之事,实则正如黄濬所提示:“(二张)论诗家,绝非论诗;必以隐语指同时朝官与党。”^④

(接上页)是一个彼此分离、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张之洞虽然后来成为了洋务派的重要领袖,但仍被当时人视为清流”(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张之洞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0页),但总体论述仍不免限于此框架中。易惠莉考察了光绪六、七年李鸿章与刘坤一间的湘、淮之争,呈现当时的钳制治术(易惠莉:《光绪六、七年的晚清中国政坛——以刘坤一与李鸿章之争为中心的考察》,《近代中国》第1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8-79页),已关涉到在刘、李二氏冲突中李鸿章与“清流党”的合作。陆胤则认为“清流”“洋务”不过是对外门面语,“奏章之间的前后唱和将言论不断推向极端,却未必符合各自治学、处事的本来主张”(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页),但缺乏进一步的实证。

①戴海斌:《清流、洋务“各有门面”?——以李鸿章与张之洞早期交往为线索》,《史林》2021年第1期,第111-128页。

②刘禺生著,钱实甫点校:《龙树寺觞咏大会》,《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97年,第90页。李鸿章与张佩纶的交往可参考姜鸣:《李鸿章“夺情”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张佩纶李鸿章通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4-22页。

③黄濬著,李吉奎整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13年,第448页。这些文字最早刊布于《河北月刊》第4卷(1936年)第1期的许同莘“旧馆缀遗”专栏中。

④黄濬:《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53页。

近代史所藏张之洞书札(甲 182-371 档^①)存有大量张之洞致张佩纶书信抄件(少量为张之洞致李鸿藻书信抄件),对比《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的书信,抄件大多有月日时间且内容未被删节,数量亦远超辑录的书信,可知此档或为许同莘当年据张佩纶家所藏张之洞手稿抄辑之件。此外,许同莘在编辑《张文襄公全书》时曾言张之洞无手书底稿,收信人又往往视为珍宝不肯公示,故而张之洞书札更显弥足珍贵^②。本文所刊布的近代史所藏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均为未刊,从中颇可窥见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情况,进行考订释读也可补各版本《张之洞全集》之不足。

一、“清流”的崛起与张李初步合作

目前所见,张之洞与李鸿章最早的直接交集在同治八年(1869)。其时李鸿章因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授湖广总督;于同治八年正月抵湖广总督任,十二月督师赴黔,随后湖广总督由其兄李瀚章署理。张之洞则于同治二年考取探花,交结军机大臣李鸿藻,频放考差、学差,六年奉旨放湖北学政,与李鸿章同城为官接近一年。这一年,张李二人虽在创设经心书院上互相合作,但张之洞显然不快。如对家人言有掣肘之感,称:“至此官与人相处动须迁就,绝不能一意孤行,崭然自立,面目殊令人不快耳。”^③李鸿章曾就郧阳发生的胡树棻学案致函张之洞结案,并为处理此案草率的郧阳知府求情宽免^④。显然,张之洞对于督抚、州县官插手学政事务颇为不满。

同治九年八月,李鸿章因处理天津教案,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随后兼任北洋大臣。十月,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回京,与翁同龢、潘祖荫、王懿荣、陈宝琛、吴大澂等文人官僚结识,形成其交游圈子。十二年,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旋放四川学政。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入都覆命,在穆宗升祔的讨论中虽未有上奏的权力,却颇为留心,陈宝琛云张之洞“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⑤。五年二月,张之洞授国子监司业,获上奏的权力,在吴可读尸谏一事中维护慈禧太后权力来源,受到慈禧太后的青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现已并入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并入后尚未完全开放。因笔者查阅相关档案时在并入前,为称引方便,本文仍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下文简称“所藏档”)条目编号。

②许同莘:《张之洞年谱史料》,“所藏档”,甲 622-3。

③《张之洞亲笔家书》,“所藏档”,甲 182-262。

④李鸿章:《复张学使》,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⑤胡钧:《张文襄公(之洞)年谱》,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9页。

睐。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邓承修等相互引援,隐奉军机大臣、北派领袖李鸿藻为首,以清议大张声势。

李鸿章对李鸿藻和清流物议不太以为然。在处理滇案的过程中,他曾写信给其兄,表达对当轴和清议的不满^①。除了洋务办理意见不同,李鸿章对所谓“南城士大夫”肆意弹劾亦不谓然,对张之洞入奏的东乡案及郑溥元弹劾山东巡抚文格一事评价道:“星轺四处,大非佳事,都人亦有私议,盖上市事从严,当轴间有迎合。今日封疆真不易为,难保终必无查办之举,可惧也。”^②

然而,李鸿章曾有意拉拢提携张佩纶、吴大澂等人,通过这层“南城士大夫”的交游关系,张之洞与李鸿章有间接的联系。光绪四年,因河间府灾情严重,李鸿章奏派吴大澂、盛宣怀、李金镛筹集赈款。在吴大澂的倡议下,籍贯直隶南皮的张之洞公捐之余,另筹集1560两,事后李鸿章为诸人请奖^③。五年,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在此之前,张佩纶、张之洞等人就谋划以文字向李太夫人祝寿。据《张佩纶日记》记载,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张佩纶邀约陈宝琛,请其修改寿文序言;张之洞则作《合肥李相太夫人八十寿诗》祝贺^④。但由于观念和圈子的不同,张之洞、李鸿章二人在光绪六年以前,除了在湖北,并无太多直接的交集。

直至光绪五、六年间由于张佩纶和李鸿章关系渐趋紧密,加以中俄伊犁交涉、中日琉球交涉,张之洞与李鸿章再次有了直接的交往。

同治十年,沙俄趁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机,借口维持边境秩序,悍然派兵占领伊犁。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清廷多次向沙俄索回伊犁未果。光绪四年,清廷派署盛京将军崇厚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前往俄国办理伊犁等事宜。其后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及相关附约,并不待清廷批复,自行回国。条约虽规定将伊犁归还中国,但南境、西境的领土则割让给俄国,伊犁成为孤城;且条约对修改中俄边界、赔偿军费、免税贸易、增辟通商线路、增设领事等事作出规定。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哗然,一时杀崇厚、拒条约、对俄备战之声鹊起。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因中俄伊犁交涉问题,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⑤,此折言语豪壮且规划全面,在朝野引发极大反

①李鸿章:《致李瀚章》,《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441页。

②李鸿章:《致李瀚章》,《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09页。

③李鸿章:《京外捐赈河间片》,《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184页。

④张佩纶著,谢海林整理:《张佩纶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5页。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461页。

⑤张之洞:《熟权俄约利害折》,《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21-23页。

响,《北华捷报》称这封奏折“非常应该被称为重要文件,因为它对中国在此紧要关头不得不解决的紧要问题,清楚地表明了一种观点”;数日后编辑部甚至将张之洞此折全文译出刊登^①。张之洞由此也以“洋务”鸣世。十七日,上谕命张之洞于二十六日前往总理衙门会议,张之洞从而实际参与到“洋务”当中。本年七月间,张佩纶归葬其生母、妻女,后丁忧期间,数次前往天津与李鸿章深谈交流和考察海防。光绪六年二月十一日、三月二十五日,张之洞给在天津的张佩纶连发两信:

得天津发书,甚慰。合肥事,以求杰士、汰宵人为第一义。战舰以多为贵,蠹船既不可恃,铁船不必阻止,勿购废坏者,闽广人不可不用,赫德不可不防,大要如此。四月到津,速示大略为幸。(日事望详询。)钟粹宫(谓西一位)违和旬馀,近稍愈矣,条目闻已有初稿,人云不缪,犹未详询。谷士已来,向史馆四传事(增孝友,旧例所有也。)告以规抚条理而去,无人奈何。襄事劳瘁,伏维珍卫。不尽。二月十一日

两奉津门发书,甚慰甚慰。尊论洞达,朝夕赞画,宏益必多。位置曹公,极中肯綮,尊槭已交,当力言之。中国今日人才物力,海防易,海战难,控大连湾、旅顺是海战也。战倭易,战俄难,两铁船足备倭耳。合北洋三口之税以养水师,沿海屯防,自是胜算,能力赞之否?求开屯之人才而不得,决无此理。初五日集议驳去一条,晦庵先生所谓徒多为人所憎恶而已。长春宫圣体渐安,初八日已传膳,尚未复元视事。二十五日^②

《花随人圣庵摭忆》将两信合并为一信,下划线文字为删除部分,并把时间定作光绪七年;武汉版《张之洞全集》仍之^③。实误。所谓“钟粹宫(谓西一位)”“长春宫”皆指西太后慈禧。长春宫为其所居之地(以下信件提及“长春”者指意相同);钟粹宫为太后所居之地,因慈安居于钟粹宫,为防张佩纶误会,张之洞特加小注“谓西一位”,两信皆言光绪六年慈禧太后的大病。“曹公”指为“清流”所看重的前甘肃提督曹克忠。据《张佩纶日记》可知,张佩纶于光绪六年二月初五日到达天津,后回乡归葬,直至三月初一日再回天津^④。

①CHANG CHIH-TUNG'S MEMORIAL,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80-5-25. Official Papers: CHANG CHIH-TUNG'S MEMORIAL,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80-6-1.

②《致张幼樵》,《张之洞书札》,“所藏档”,甲182-371。

③黄濬:《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49页。张之洞:《致张幼樵》,《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20页。

④张佩纶:《张佩纶日记》,第37、41页。

又,翁同龢于光绪六年二月初三日得知慈禧“圣体违和”^①,结合信中所言“违和旬馀”的病状,可知第一封信当写于光绪六年二月十一日。第二封信言“初五日集议驳去一条”,可参《翁同龢日记》光绪六年三月初五日条^②,加之信中言“两奉津门发书”“初八日已传膳”,可知此信当写于张佩纶返回天津后的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结合当时的背景可以理解此两信。光绪六年正月初八日,因李鸿藻服阙重入军机,一时“清流”对俄备战之论复振。张之洞在第一封信中谈及水师建设应注意之事。第二封信谈及战倭战俄问题,认为以北洋现有力量,沿海屯防俄国,必能获胜,希望张佩纶从中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在慈禧太后病重之初即相当留意,凸显出张之洞等人以慈禧太后为靠山,积极备战的想法。又据“合肥事”一句可以看出,成功参与到“洋务”中的张之洞,开始通过张佩纶的关系关注和联络“洋务”前辈李鸿章。然而对于“二张”与俄国作战的想法,李鸿章却认为是书生之见,并语及支持备战的左宗棠:“左帅主战,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③由于英、法等国的调停,加上沈桂芬、李鸿章、曾纪泽的极力转圜,慈禧太后、李鸿藻的生病亦为主战的“清流”减色不少,崇厚使俄一案最终和平解决。光绪六年七月初七日,上谕称曾纪泽因议改条约,为商办一切,将崇厚加恩即行释放。张之洞对此颇愤懑,当日即在致张佩纶的信中言:“俄事想已详悉,萧墙自毙,赐不幸而言中矣,然怒之者不已,何也!”^④

虽然在対俄和战立场上张之洞、李鸿章二人意见不同,甚至在言语中各有抱怨,但在张佩纶的联系下,二人自光绪六年下半年起,开始因琉球之案有了合作。上引张之洞致张佩纶第一封信所言“日事望详询”,即指中日琉球交涉之事。光绪六年二月十六日,日本大藏省少书记官竹添进一郎来津,再次与李鸿章商量琉球解决方案,提出将琉球分为南、北,南岛为中国管辖,以换取内地通商。在此前张之洞即望张佩纶到天津时详询,随后张之洞与李鸿章亦以中日琉球交涉为契机相互合作。

在当时中俄交涉,“清流”对俄积极备战的背景下,七月初十日,张之洞上《谨陈海防事宜折》,表达“联日制俄”的想法^⑤。此想法,在上引张之洞致张佩纶第二封信中可找到一定的依据,即张之洞认为日本不足惧,海防重点

①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1475页。

②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3册,第1480页。

③李鸿章:《复丁稚璜制军》,《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532页。

④《致张幼樵》,《张之洞书札》,“所藏档”,甲182-371。

⑤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31-33页。

在俄国。随后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亦上折表达“联日制俄”的看法^①。对日本一向轻视的李鸿章,则以分岛通商、联日制俄为不然,并认为俄事已渐有转机,希望总署不受清议的影响,缓结球案^②。然而总署的沈桂芬等人为了避免两面受敌,方便俄事和平解决,以张之洞、王先谦之折为借口,于九月二十五日与日使宍户玢签订《琉球条约》及其附款。条约签订后,张之洞却对此怒不可遏^③;而他愤怒的原因,可从张佩纶致张寿曾、张人骏的书信中得知:

先是南皮请联日本以御俄,王逸吾踵之。南皮但云商务,王则兼及琉球,不知日本畏俄玩华,即与联盟终归无益,而琉球案结则俄得援例以取高丽,利益均霑,则巴西各国将援例以入内地。鄙见目下不与俄战,亦可不与倭和。潜史据之以告,南皮闻亦有续作。^④

张之洞与王先谦虽然都主张联日制俄,但张之洞只谈商务,不谈分岛。在签订条约前张之洞也将相关想法告诉了李鸿藻^⑤。然而沈桂芬等人以张折的联日制俄为辞与日使签约,无怪张之洞怒不可遏。

张之洞、陈宝琛等人为此上奏请缓订条约。陈宝琛上折认为俄事准备完结,不宜速结球案,并请密寄李鸿章、左宗棠详议^⑥。十月初一日,张之洞上《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⑦,即张佩纶信中所谓的“续作”,一反前折联日制俄的观点,陈明只允商务,不谈分岛。在附片中请李鸿章节制防务,盛称其“究系更事重臣,精力犹壮,倘专其责成,当可力图御侮,固胜于今日之散涣推诿者远矣”^⑧。张之洞的折子上奏后,张佩纶当天即给李鸿章写信,称“以重臣在外,抗疏辩之,一言九鼎,定可挽回”^⑨。李鸿章于是在初九日上《妥筹球案折》作为地方疆臣的呼应^⑩。

陈宝琛、张之洞、李鸿章的折子,引起了慈禧、慈安太后的注意,重新考

①王先谦:《葵园自订年谱》,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68-84页。

②李鸿章:《复总署 请球案缓结》,《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620-621页。

③张佩纶:《致容舫安圃姪》,《涧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33页。

④张佩纶:《致容舫安圃姪》,《涧于集》,第430页。

⑤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中华书局,2014年,第247页。

⑥陈宝琛:《论球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改折》,刘永翔、许全胜点校:《沧趣楼诗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80-783页。

⑦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42页。

⑧张之洞:《请饬李鸿章节制防务片》,《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43页。

⑨《张佩纶致李鸿章》,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9页。

⑩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98-200页。

虑总理衙门主导的中日签约之事。十八日,发布上谕“此事关系全局,自应博访周咨,以期妥协”,令沿海督抚上折妥议^①。最终,由于各方压力,总理衙门决定不批准条约,球案因而搁置。

张佩纶对于促成李鸿章与张之洞关于球案的合作,对抗总署颇为得意,在致朋友的信中言:“会译署与倭定约结中山案,倭以南岛归我,我许其内地通商,潜、达上言极论,合肥亦断断称其不便,要津颇疑弟从中主持,可谓不虞之誉。”^②

二、光绪七年东南沿海督抚调整下的张李合谋

广州图书馆所编《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中有一封密信:

今日何时到北海处?想待晡后,是否尚拟出城,此刻出门否?均祈示知。缘顷晤宕公,约其午后来谈。若执事他往,便拟阻之也。(改约明晨耳。)此上
黄石先生。

廿四日四刻。丙。^③

中国古代以天干配五行,丙属火,此处“丙”代表阅后即焚。“黄石先生”,编者已经指出是较少见的张佩纶代号,因其有一种自制笺纸“黄石素书”。从“丙”和“黄石先生”可以看出这封信非常私密,此信的解读需要得知其时间和“北海”究竟代指什么。

该书前言称根据张佩纶的题记,这批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作于光绪六、七年间。然而原函并无具体年月,编者以“期”字判定带有此字之信为张之洞妻子王夫人去世服丧期间所写(即光绪五年九月后一年内)^④。实际上这个判定有误。

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一封信信称:

日来时事、家事均多烦郁,某公谬言日出,奈何奈何,悔不可追,岂非天哉?家婢近于鄂寓弃世,故有服期,并闻。^⑤

“某公”,指光绪七年在京的军机大臣左宗棠(说详第三节)。《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另有一信言:

①《清实录》第53册《德宗实录(二)》,中华书局,1987年,第758页。

②张佩纶:《致顾皞民观察》,《涧于集》,第434页。

③广州图书馆主编:《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着重号为原信所有。

④广州图书馆主编:《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前言》,第3-4页。

⑤《致张幼樵》,《张之洞书札》,“所藏档”,甲182-371。

今闻新命,诚如老氏所谓若惊者。日来彗星之见,其以此耶?敬上
绳庵仁兄。

期之洞顿首。^①

所谓“今闻新命”,指张之洞在光绪七年(1881)六月初三擢升内阁学士。结合以上两信,可知“期”实为光绪七年张之洞婢婢(而非其妻)期服,加以信中“彗星之见”,判定“今闻新命”一信当写于光绪七年六月。因此,《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这批信件应写于光绪六年底至光绪七年下半年,比编者所判定的时间晚大半年。前文提到张佩纶光绪六年初因归葬妻女出京,多次前往李鸿章处,其于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随李鸿章进京,因此密信写于这个时间之后。“北海”,张之洞的其他信件皆有提及:

请即携李北海书墨迹来同赏为幸!^②

久未上记,驰念实无已时。下缺。某此间规划粗定,惟新收文集,不可测度,夫复何尤。前者曾作两艺,不过自竭愚诚,文体合否,则不敢知也。北海乞吾宗为副,可谓得人,不审何以被抹?以后越事若何措置?合肥能强起否?此外无策矣。九老所不胜任,且太濡缓,此间处僻。下缺。^③

由此可知,“北海”指唐代书法家李邕,曾任北海太守,密信用以代指李鸿章。李鸿章于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因慈安安葬事携张佩纶进京,至四月十三日离京返津。因此,密信当写于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四刻。“请即携李北海书墨迹来同赏为幸”一信,也并非谈共同欣赏李邕的书法这种风雅事,而是张佩纶在京时,张之洞请求张佩纶将李鸿章的书信携来阅读,以便了解相关情况。

通过上文对时间和隐语的考订,可知密信涉及光绪七年三、四月间张之洞与李鸿章关于东南沿海督抚调整的合谋。光绪六年十二月,南派领袖沈桂芬因病去世,李鸿藻隐掌中枢,辅以在中俄交涉中壮大的“清流”。七年三月十一日,慈安太后去世,内朝权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面对“非常之变”,三月十四日,张之洞给天津的张佩纶写信说:

非常之变,出于意表,以后事体,不敢设想,幸长春起居日来尚可,十一日因悲痛劳碌脉证颇退,近日稍定,诸证如旧,惟食后嘈杂,夜寐不适,痰中微有血沫,(此以前旧有而近来已愈者。)好在泄泻未犯,惟盼徐

①广州图书馆主编:《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第30页。

②广州图书馆主编:《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第94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以下无特殊说明皆同。

③张之洞:《致李兰荪宫保》,《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40页。

徐将息,日有起色,则为天之福矣。大局尚属定帖,闻要务仍稟承懿训,情形似尚妥慎,以上各节,谨众口传闻者奉告,以慰荏靡。执事到彼后,一切情形未示及,殊为驰系。鄙意谓处此时惟以镇定不扰为上策,已沥晓同人矣,尊见以为何如?十四日^①

由于慈安太后去世,慈禧太后大病尚未痊愈,为防权力格局再生变,张之洞在信中详细报告了慈禧的病状,同时希望张佩纶告知李鸿章方面的情况,并表示暂时以镇静为主,待李鸿章来京处理慈安之事再商量。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到京。次日,张之洞即迫不及待地给刚从天津回到北京的张佩纶写了上引“黄石先生”密信。信中张之洞询问张佩纶今日是否出城去李鸿章处,如果出城,便改约明日商事,并要求阅后即焚。张佩纶当日下午即前往李鸿章处,但由于李鸿章拜访李鸿藻,双方没有见面,李鸿章即邀张佩纶次日再见^②。二十八日,张佩纶写信给李鸿章,盛称张之洞“忠诚博懿,十倍于佩纶”,表达张之洞希望与李鸿章会面的意愿。李鸿章请张佩纶定于明日辰、巳间与张之洞会面,并留午饭^③。二十九日,宝廷与张之洞各自上折,请延留李鸿章在京与商洋务^④。因二人的上折,李鸿章直到四月十三日方才离京返津。

其后四、五月份东南沿海督抚的调整,正是出于李鸿章与张之洞、宝廷、李鸿藻等“清流”的合作。如张佩纶所言:

合肥于前月廿二日到京,长春官圣体尚未康复,特于体元殿召见,初二日请训,因宝阁学、张学士奏请留合肥与枢垣详议边、海各防,有旨命缓至十二出都,现在议定。如闽抚各员纷纷调动,均主合肥之说。^⑤

四月初八日,为“清流”看重的主战派岑毓英调任福建巡抚。五月十五日黎培敬授江苏巡抚。同日,李鸿章亲家任道镕迁山东巡抚。而最重要的两江总督,李鸿章推荐志同道合的丁日昌取代湘系大臣刘坤一,但受到奕訢和徐桐的反对而作罢^⑥。出于公义私情,“清流”不断组织弹劾刘坤一。刘坤一明显感觉到了来自“清流”和李鸿章的压力,甚至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指明张之洞在当中谋划:“香涛以弟为作料,然为作料者不止第一人,以弟为作料又不

①《致张幼樵》,《张之洞书札》,“所藏档”,甲 182-371。

②《李鸿章致张佩纶》,《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 106 页。

③《张佩纶致李鸿章》,《李鸿章致张佩纶》,《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 107、108 页。

④宝廷:《请飭留李鸿章详议大局片》,《竹坡侍郎奏议》,台湾学生书局,1976 年,第 379 页。张之洞:《集重臣等议急务折》,《张之洞全集》第 1 册,第 45 页。

⑤张佩纶:《复奎乐山观察》,《涧于集》,第 439 页。

⑥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李鸿章全集》第 33 册,第 41 页。

止香涛一人。”^①七月二十八日,上谕命刘坤一到京陛见。刘坤一在两江总督任上短短几个月即卸职,两江总督之任由彭玉麟署理。刘坤一的内召引发各种猜想,关注中国政局的《北华捷报》留意到,当时中国官员普遍认为刘坤一内召是由于张之洞弹劾,而且《北华捷报》认为刘坤一卸任两江总督,实际上打击了左宗棠反对李鸿章洋务计划的外援,同时抓准清廷希望派一位对洋务开明熟悉者任两江总督的想法,但不太看好丁日昌或郭嵩焘任两江总督的流言^②。闰七月初五日,张之洞上《疆寄虚悬请早处置折》,吁请开去陕甘总督曾国荃之任,另选要员;两江总督应催促彭玉麟上任;江苏、山东巡抚须命黎培敬、任道镕赴任^③。至此,张之洞为光绪七年三、四月间李鸿章与“清流”共谋的东南沿海督抚调整计划一锤定音。

三、湘淮之争中的张之洞与左宗棠外调江督

在伊犁交涉、琉球交涉之时,张之洞等人对左宗棠积极响应备战充满希望,张之洞曾向李鸿藻言:“言防务,则决其今年兵衅之必不能开,专即筹兵待将(将即左为主),盖某深知目前则不能战,左来则兵备已齐而可以战。”^④慈禧太后出于湘淮互制,同时打击恭王与李鸿章合作的考虑,利用“清流”的言论,于光绪六年七月初六日发布上谕,命左宗棠来京陛见^⑤。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命左宗棠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⑥。左宗棠从而直接参与直隶的水利兴修、练兵及《烟台条约》关于鸦片“税厘并征”的讨论,分割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权力。

李鸿章对于左宗棠取代病逝的沈桂芬进入军机并不意外,但不免有时运转移、湘淮高低之叹^⑦。然而九月六日,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李鸿章与“清流”的相互合作不可忽视,其中自然有张之洞的身影。

上一节已提及,光绪七年三、四月间,在京的李鸿章与李鸿藻、张佩纶、张之洞往来不断,相互拜访。在“清流”与李鸿章关系拉近的同时,左宗棠由

①刘坤一:《复李若农》,陈代湘点校:《刘坤一集》第4册,2018年,岳麓书社,第456-457页。

②THE RECALL OF LIU K'UN-YI,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81-9-9.

③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47-48页。

④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第244页。

⑤《清实录》第53册《德宗实录(二)》,第688页。

⑥《清实录》第53册《德宗实录(二)》,第821页。

⑦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12页。

于无法及时掌握权力动向,加之性格粗率,导致其在京、直的种种行为和言论令张之洞等人颇为不满。四月十六日,左宗棠上折请所调湘军先修水利暂缓练兵;五月初五日,上折疏言对鸦片税厘并征所拟办法,即进口鸦片税厘并征,共银150两,土鸦片价格低,请照洋鸦片税厘值推算;五月十一日,左宗棠到达涿州督修水利,并上折推却孙诒经请奏的张佩纶、张之洞参与兴修水利之事^①。

近代史所藏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信,可以说明张之洞对左宗棠、李鸿章态度的转变。以下信件皆写于光绪七年五月至六月间:

药厘、水利两事,合肥议论如何?望示及。陆龛书画表究已成书否?恪靖十一日出京,密勘水利,闻报十余日便回。发端先至涿州,次以则无定向,然不到天津,真一奇也。闻其回京后拟即赴关东行边。

(以上皆渠自向人说。)慈圣起居日胜,敬以告慰,确非骨蒸也。初八日^②此信写于五月初八日,张之洞向张佩纶询问李鸿章对左宗棠调湘军于直隶兴修水利的态度。并好奇,左宗棠来京时为何不去天津与李鸿章商量。由此可见,经历了光绪六年下半年的中日琉球交涉和光绪七年三、四月间的东南沿海督抚调整,张之洞已对李鸿章态度改观,关心李鸿章的权力和利益。

药厘事,恪靖专疏言之,不提税,但加厘,已下海关、督抚议行,津门当已备知,并未知照威使。此举奇横有趣,中国事向来失之弱懦,此却太横。但积弱之后,稍变局面,亦可令彼族夺气。十日之内,威使必至译署饶舌,诸公须撑持得力方妙耳。闻西军已调至涿州,恪靖意欲即在涿州动笔,真所不解。此等事,总须通筹全局,计划经费,分别轻重缓急,先后次第,再为落笔,岂有率尔操觚者?虽有会议章程之文,某公总是独断独行,必不候章程议定再作文字也,极好题目,而文笔草率,赞助难,补救亦难,真令人气闷。^③

五月初九日,上谕将左宗棠《严禁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折》交海关、督抚议行^④;五月十一日,左宗棠出发至涿州兴修水利^⑤。此信当写于五月初九或初十日。从信中看,张之洞认为税厘并征至150两,远远超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坚持的80两,亦高出李鸿章主张的120两,过

①左宗棠:《敬筹见调各营先修水利暂缓练兵折》《严禁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折》《覆陈涿州工作已可就绪情形折》,《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1986年,第9043-9065页。

②《致张幼樵》,《张之洞书札》,“所藏档”,甲182-371。

③《致张幼樵》,《张之洞书札》,“所藏档”,甲182-371。

④《清实录》第53册《德宗实录(二)》,第868-869页。

⑤《张佩纶致李鸿章》,《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134页。

于强横,威妥玛必然到总署饶舌。此信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亦有转录,下划横线的文字(为被删减的部分)表达了张之洞对左宗棠的不满。张之洞认为以涿州着手兴修水利,实在是轻重不分,而左宗棠总是“独断独行”、做事粗率,以致无法补救挽回。由此可知张之洞从中俄交涉之初对左宗棠的赞赏,至此已转变有厌恶之感。

恪靖于十一日亲赴涿州一带定局,然闻其并不到津与肃毅面商,殊不可解。而水利事至今不闻肃毅一言,亦不可解。窃谓执事在彼,得进言处即须进言,不然左日有建白而李寂然,相形之下,其谓之何?恪靖两次建议,旁人又稍稍青眼,可叹可叹!①

左宗棠于五月十一日到达涿州,十九日前往金门闸坝,此信当写于此数日间。传言左宗棠不去天津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会面(实际二人于五月二十三日会面),张之洞再次致信张佩纶,希望得知冷眼旁观的李鸿章的具体态度,并希望张佩纶能在旁“得进言处即须进言”,以免“左日有建白而李寂然”。

归后知晡后恪靖过访,此老既衰不谓然,而又数数见顾,殊不可解。

明日听宣后,拟就便答之,惟与之正论则不入,(衅隙益深,亦无谓也。)

附和则不能,默然听受则不成礼,何适而可?请教。②

此信当写于六月左宗棠归京后,张之洞对左宗棠频频来访颇有不屑和疑惑,对张佩纶言打算对左宗棠冷眼相待。

通过张佩纶的关系,李鸿章与在朝的张之洞相互联络。在双方的互动下,五月二十日,李鸿章上折复陈左宗棠兴修水利之举,称水利宜修,但巨款一时难以筹集,只能次第办理③,以此与二张相呼应。除了通过张佩纶联络天津的李鸿章,张之洞在内朝亦向李鸿藻抱怨左宗棠的粗率自大,而盛赞李鸿章老成稳重:

看来此公性情病痛无可救药,一人力争亦必无益,徒多行迹,惟有听其自然,不惟不必力争,直不必与之辩驳,一听容之所为,俟其兴阑意沮,合肥发有议论,与立异同时,再为相机补救,庶有济乎!(所以欲力争者,不过以此系美举,希冀此公如可匡救为之,随时修补或改正,或扩充改成一篇好文字耳。如今看来,决无办好之望。赖有合肥牵制,或不致大坏耳。)④

在二张的串联下,左宗棠无论是作为“文章着笔”的兴修水利,还是在军

①《致张幼樵》,《张之洞书札》,“所藏档”,甲 182-371。

②《致张幼樵》,《张之洞书札》,“所藏档”,甲 182-371。

③李鸿章:《复陈直隶河工情形折》,《李鸿章全集》第 9 册,第 364-367 页。

④转引自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第 280 页。

机、总署上的“洋务”，均无太大建树，且时有掣肘之感。自七月份起，就不断上疏称病请假^①。三、四月间因东南沿海督抚调整而空缺的两江总督，成为朝廷安置左宗棠的去处。九月初六日，朝廷命在京郁郁不得志的左宗棠为两江总督。

四、余论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张之洞擢升山西巡抚，逐步建立起“清流”之外的权力和信息网，从京官转变为地方大员的张之洞，和李鸿章的关系可以说转入下一个阶段。笔者将另文阐发。

辛酉（1861）政变后，原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运行模式代之以太后垂帘听政，亲王入枢秉政的权力模式，此后同治、光绪虽曾亲政，但权力的中心在慈禧太后，直至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世。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慈禧利用朝廷满汉、南北、湘淮等各派势力，稳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在内朝，李鸿藻、沈桂芬的入枢标志南北派系格局的确立；而在外朝，咸同军兴导致湘淮系崛起，学界虽然对于罗尔纲的“内轻外重”的说法有所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起码直至甲午年（1894），平衡湘淮系势力是朝廷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各派系间分合，即是这种政治牵制的体现。

具体到个人而言，本文通过考订释读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探析了作为“清流”的张之洞早年与李鸿章的密谋、合作。由此可见，所谓的“清流”与“洋务”确因政治利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此，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关于张之洞从“清流”向“洋务派”转变的说法值得商榷。首先，晚清的“洋务”话语关涉到许多层面，既包括学习西方近代器物、制度，也包括对外交涉。与李鸿藻、倭仁等理学名宗厌谈“洋务”不同，被别人称作“清流”的张之洞在中俄伊犁交涉中以“洋务”得名，“洋务”是张之洞与李鸿章能够合作的基础。作为世家子的陈寅恪，在回忆晚清“清流”时，有一种特殊说法：

自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奕訢、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楨、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等为浊流。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

^①左宗棠：《宿恙举发请赏假调理折》《请赏假折》《病难速痊恳恩开缺撤销各项差使折》《仍恳天恩开缺撤销各项差使折》，《左宗棠全集》，第9065、9067、9069-9072、9077-9079页。

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①

这种说法与现在认知颇不同。其将张之洞一直视为“清流”,可知无论是在京为言官,还是在山西、广东、湖北引进西方技术、创办西式机构、创建新式军队,张之洞的思想和行事具有相当的连续性,不存在一个很大的转变。张之洞是有“清流”之名而行“洋务”之事。其次,在光绪初年,张之洞不仅与“南城士大夫”群体交往密切,而且与李鸿章暗中联络。日后张之洞在山西的“新政”,离不开李鸿章给予的资金、人事、机器支持,其中一些从李鸿章处获得的洋务人物,如李先义等,一直追随张之洞,成为张之洞早年重要的洋务班底。这种交错的人事关系亦是一种连续性的体现。

第二,张、李交际的日后影响及转变。张之洞光绪初年的擢迁,李鸿藻的作用自然较大,但以“洋务”鸣世的张之洞,如果没有外朝李鸿章的配合,无法具备相应的话语权。然而,张、李间虽有直接密谋与合作,但也有许多是通过张佩纶的联系,张、李二人在光绪初年建立起来的不算太紧密的关系,究竟对张之洞日后抚晋、督粤、督鄂有什么影响?在山西巡抚任上,张之洞已开始建立自己作为地方大员的信息和权力网络,逐渐独当一面。中法战后张佩纶、陈宝琛被罢官免职,李鸿藻亦在十年后才重入军机,而张之洞在中法战后地位、名望不断飙升。光绪十年七月,张之洞实授两广总督,其在广东吸纳洋务人才,“洋务”渐有声色;数年后调任湖广总督,更是大办“洋务”,令全国瞩目,成为与湘淮系重臣直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并驾齐驱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独当一面的张之洞与李鸿章关系如何转变,涉及许多具体问题,值得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作者信息】刘青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晚清政治史。

^①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91页。